

# 伦敦：私人的城市，公共的城市

LONDON: PRIVATE CITY, PUBLIC CITY

阿德里安·福蒂 / Adrian Forty

**摘要** 本文详细描述了伦敦曾经作为一座具有强烈的私人性质城市的特征，并通过对伦敦城市历史发展的介绍和分析，进而引用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实践来证明和阐述了过去20年里，伦敦是如何从原来的私人城市化趋势的城市，逐渐转化为一座具有明显的公共社会面貌的城市。文章强调指出，伦敦的这一变化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到了促使英格兰人走出他们的家门，到公共场合去同陌生人一起享有生活在一座大城市中的体验。

**Abstract:** This article features London as a city previously highly in its privacy. After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Lond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 number of practised projects here highlighted to help elucidate how London transforms from a previous private city to a prominent public on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ransformation has helped English step out of their homes and begin to have experiences of living together in metropolis with other races.

**关键词：**伦敦，历史，公共建筑，社交空间

**Key words:** London, History, Public buildings, Social space

对来访的中国人来说，伦敦是一座人口密度低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城市。大面积地向外铺开，而其主要建筑类型却是2~4层的住宅——这样一座城市怎么可能既生动又充满活力呢？即使在靠近伦敦西区（West End），也就是伦敦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区附近，人们也能看到一条又一条由连排式住宅（Terrace Houses）形成的街道。尽管这些住宅中有些已分割成公寓住房，更多的却仍然以独户住宅的形式使用着，每栋住宅后面都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sup>[1]</sup>在这些两边夹以连排式住宅的街道之间偶尔插入一个广场，周围的住宅都面向这块作为公用花园的空地。这种建筑布局导致宽敞的城市聚居空间，而且似乎给家庭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但它并没有为城市群体文化的产生创造多少条件。在建筑密度这样低的情况下，商业活动则变得非常分散，只围绕着偶然形成的一组商店和一家“酒屋”（“pub”）<sup>[2]</sup>展开。这种商店组群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事实上大多数街道上没有任何商店或其他商业活动。按照目前中国人的标准，这些街道看上去好像被遗弃了一样，而通常给城市带来活力的嘈杂与繁忙也似乎与它们毫无关系。这种低密度以及私家花园和绿化所占用的大量用地虽然构成了赋予伦敦以风韵的因素之一，可是正如国外的许多来访者所指出的，它们也使伦敦成为一座具有强烈的私人性质的城市；在这个私人城市的环境里，社会生活几乎全部集中在家庭生活当中。过去20年在伦敦发生的所有变化中最令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恰恰是这种私人城市化趋势的逆向发展，使伦敦第一次转化为一座具有明显的公共社会面貌的城市。换句话说，伦敦城市的社会生活过去只在私人之间进行，现在则已经变得能够在公共场合下享受。

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一转变过程。历史上，伦敦并非是一座没有公共空间的城市，但其公共空间全都在户外，也就是它的各个公园（parks），与绝大多数都市相比，伦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享有众多的公园和空地，这些公园和空地——诸如海德公园（Hyde Park）、摄政公园（Regent's Park）、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汉普斯特德绿地（Hampstead Heath）等——都对城市居民开放，尤其在夏季的几个里，更是人们频繁光顾的地方。来访伦敦的人不断为见到这些公园感到意外，因为它们完全不同于多数欧洲城市中

所能见到的那种形式规整、秩序井然的市区园林，而是看上去更像一块块乡村的田野或未开垦的牧场；它们避开了建筑营造的烦扰，因此仍保持着似乎未经人工雕琢的纯朴的自然状态。丹麦建筑师斯滕·艾勒·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在他193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伦敦：独特的城市》（London: The Unique City）中热情地描述了伦敦的公园。正像他所概括的，这些作为社会化空间的公园所产生的效果就好像一位光顾汉普斯特德绿地的伦敦人“生活在一种快乐的幻想中，即在一片杳无人烟的土地上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然而尽管伦敦的公园或许的确为自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尽管它们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人们对他们的利用却局限在白天的时间里，而且更多的是发生在夏季。听起来尤其荒唐的是，唯一真正能过上城市生活、能与城市人口中所有阶层的人自由交往的机会，恰恰发生在一种人们有根本不在城市中的幻觉的地方。除此之外，在城市的街区当中，没有任何一处能让人有机会见到作为一个群体而出现的伦敦市民，更不用说自由自在地混入人群之中了。

19世纪建造的其他欧洲城市都为这些社会生活的需求创造了条件：要么是拱廊街道（arcades），即由玻璃拱顶覆盖、两边布满商店的步行街；要么是由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sup>[3]</sup>在19世纪的巴黎创造的一种新型街道，即林荫步行街（boulevard），虽然伦敦也有拱廊街道——例如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南北两侧幸存到今天的那几条，但他们既不像米兰的拱廊商业街（Galleria）那么宏大壮观，又不像巴黎的拱廊街道那么为数众多。伦敦的拱廊街道只是以一种次要的方式为其群体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点方便。另一方面，林荫步行街在伦敦根本不存在。单就其从未采纳这种颇具特色的街道形式这一事实来讲，伦敦在欧洲城市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奥斯曼所创造的林荫步行街是一种敞阔的街道，人行便道很宽，两边是排列在一起的商店和咖啡馆。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任何一位步行者都可以一边从容不迫地漫步在这样的街道上，一边随意看看咖啡馆里都发生了些什么或看看街上其他的行人；他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悠闲地向外观望，注视着便道上来往的行人。借助于这种新型的街道，个人变成了城市生活中表

作者简介：阿德里安·福蒂，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历史教授

译者简介：许亦农，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

收稿日期：2002-05-20

演者和旁观者二合一的角色，既可以观看众人同时自己也在别人的视线中。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sup>[4]</sup>把这样的“个人”称作“闲人”(flaneur)，并且赞美这种行为，说它是人们对现代城市的适当反应。可是伦敦未曾建造林荫步行街，因此从来没有为“闲人”的产生和存在创造机会，而且除了那些公园之外，伦敦也从来没有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共同参与的公共社会生活方式提供条件。

在伦敦没有建造林荫步行街的原因不能用气候条件来解释，尽管有时候人们的确是这么断言的，因为伦敦的天气与巴黎的相比既没有过多的雨水也不过分寒冷。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由伦敦的低密度城市发展提供的。巴黎和欧洲其他城市中心区普通建筑的高度都是6~7层，而在19世纪的伦敦，大多数建筑均不超过4层。这样低的住宅密度不可能使足够多的人聚集在任何一处；没有足够的客源，酒吧和咖啡馆也就不可能在经济上维持下去。可恰恰是因为这种酒吧和咖啡馆的存在才促成了充满“闲人”的巴黎街景的出现。所以伦敦一直没有发展一种以街道、人行便道、咖啡馆为中心的文化；在这些场所里，个人可以既是表演者又是旁观者。相反，寻求社会生活的伦敦人都被赶进室内——在各种俱乐部、剧场或住宅中去发现社会意义。

从历史上讲，向社会所有阶层的人开放的室内空间是由咖啡屋(coffee house)提供的。在这些开始于17世纪的咖啡屋，人们除了可以买咖啡，还可以免费读到在当时相对来说比较昂贵的各种报纸。由于向所有阶层的人开放，这些咖啡屋成了各种各样的人可以互相交往和交换意见的地方。然而在18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咖啡屋的服务内容变得日益专门化，而且其服务对象也变得日益排他化——随着某一特定的社会族群逐渐控制了某一咖啡屋，那么这个咖啡屋就倾向于限制其他人使用这些设施。这种社会族群可以是那些专门从事某种生意或买卖的人，也可以是附着于某一政党的人，再或是归属于某一社会阶层的人。最著名的由咖啡屋演变下来的机构是现在作为保险市场的劳埃德协会(Lloyd's)，最初这是一家咖啡屋，后来商人们在这里成立了企业联合组织或辛迪加(syndicates)，为他们自己和其组织之外的人提供业务保险。<sup>[5]</sup>

其他留存下来的咖啡屋有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在圣·詹姆斯大街(St. James's)上的绅士专用俱乐部——怀特俱乐部(White's)和布德俱乐部(Boodell's)，这些都只对其会员开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曾经向公众开放的地方，到了19世纪初却变成了其会员资格受到限制的机构。如果人们要问后来有什么设施取代了咖啡屋作为向公众开放的地方，回答是：什么也没有，因为即使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酒屋(public house或pub)，在那里当然主要是买酒，特别是啤酒，也绝没有发展成像过去的咖啡屋那样各阶层的人都可以随意来光顾。伦敦酒屋的主要顾客来自于工人阶层，因此不可能向咖啡屋那样促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之间的混合和交往。

在比较缺乏人们可以会面和在公共场合聚集起来的地方的情况下，家庭在英格兰的社会生活中相对来说就变得更重要。也正是家庭的那种特殊外在形式，即独户住宅，在19~20世纪的伦敦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建筑类型。虽然其他一些住宅形式，比如多层公寓大楼，普遍存在于其他欧洲城市里，它们只是到了19世纪晚期才在伦敦出现，而且直到20世纪时仍然并不常见。绝大多数新盖的居住建筑就像现在一样还是独户住宅。铁路交通和19世纪晚期的有轨电车以及地铁为人们进入这种建筑发展形态所需要的大面积区域提供了方便。的确，也正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伦敦的建设区域发生了急剧膨胀，从而使它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伦敦用地面积的广阔与其占主导地位的住宅类型有直接关系。与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及亚洲国家的住房相比(但北美洲的除外)，英格兰的住宅面积更大也更舒适。甚至现在从欧洲来的人仍常常会为伦敦住宅的宽敞以及平面设计上的浪费而感到惊讶。因此尽管伦敦的住宅贪婪地消耗了土地面积，从而给城市的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但它们反过来还是为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阶层的人们提供了在欧洲其他城市所达不到的一定程度的舒适和私人生活的保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每栋住宅都与其邻近的其他住宅隔绝开来；而在住宅里面，进入任何一间屋子绝对无需穿过另一间，因为每一间都直接对门厅或楼梯走道开门。由于房间之间互不相通，因此每一间都获得了通常在欧洲大陆类似住宅平面中少见的私密度。英格兰住宅的这些



1 19世纪早期伦敦郊区的住宅与街道 / Early 19th century Houses and Street in inner suburban zone of London

2 19世纪早期伦敦郊区住宅 / Houses built in early 19th century in inner suburban zone of London

3 19世纪晚期伦敦郊区的住宅与街道 / Late 19th century houses and street in inner suburban zone of London

4 图3住宅后部的花园 / Gardens behind houses shown in picture 3

特点更使得家成为一个消磨闲眠时间的适宜的场所，从而为家庭之外公共社会生活的缺乏提供了一项补偿要素。

这种住宅是伦敦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单元；其享有的绝对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城市的经济基础造成的。伦敦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不是一座工业城市。19世纪为英国创造了财富的工业，包括纺织业、工程技术业、造船业等，大部分分散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而伦敦却是一座商业和政治城市，并不以制造业为其主要运作内容。商业集中在伦敦市（City of London），这是银行、商人和交易所等汇聚的地区；政治机构则设置在泰晤士河上两英里沿着西河岸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行政区和白厅（Whitehall）大街附近。<sup>[6]</sup>两个地区在19世纪产生了各自独特的建筑类型：伦敦商业中心区（the City）充满银行、交易所和保险公司办公楼，而沿着白厅大街的是政府各部门大型建筑；所有这些对外都不开放，只有其雇员才可出入。伦敦的工业大部分是服务业，专供城市人口所需；其以家具生产、钟表和其他仪器制造、服装生产等为主的制造业则组织成小规模的生产单元。要么在生产者自己家里，要么在小型作坊中。英格兰北部城镇中常见的大型工厂20世纪以前在伦敦很少见；只是到了20世纪后大型工厂才开始在伦敦郊区出现。伴随伦敦制造业规模小这个特点而来的一个现象是城市里缺乏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英格兰北部许多城市的大工厂里工人的大量集中促进了工会的形成；伦敦则不同，它不但没有这样的组织形式，而且总体来说同样也缺少那种鲜明的工人阶层的文化，也就是在与工厂生活协调发展的工人俱乐部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文化。伦敦的劳工结构和工业模式不趋向于发展在家庭之外享受社会生活的传统。对工人阶层来说——对中产阶级也一样——家就是社会生活的场所；这一倾向性又因伦敦住宅的相对宽敞与舒适而得到了加强。

虽然伦敦商业中心区各机构的建筑把人们的注意力导向各公司、企业的财富和影响，虽然威斯敏斯特行政区和白厅大街的政府建筑显示出英国国家的政治力量，但伦敦在20世纪初给人的突出印象却是一座由其居民的个人利益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这是一座主要由住宅构成的城市；尽管这些住宅的形制整齐化一，每一栋住宅却又因其独特的向

街宅门和宅间充当防火墙的隔墙而有其自身的识别性，从而可以与其邻近的住宅区别开来；城市因而成为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组合体。这些特点只能有助于加强人们对城市的这种印象。为扭转这种趋势而作出的尝试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时候，成立于1889年的第一次代表伦敦各方面共同利益的地方政府组织——伦敦地区行政委员会（London County Council，简称LCC），开始建造面貌崭新的住宅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建筑物。LCC为工人阶层建造的住宅都是六层的公寓楼，其设计尽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独户住宅的面貌特征，同时却强调整体的统一性，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并不能改变社会生活的基础，不过LCC还主动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从而为公共生活创造机会。这些措施中最好的例子就是1920~1930年代在伦敦各处修建的内含露天游泳池的丽都娱乐场（lidos）。<sup>[7]</sup>这些丽都娱乐场都建在伦敦的公园里，因此他们本质上是这些公园自身的社会功能的强化，为人们提供了额外的户外活动条件，比如人们可以一起享受游泳、日光浴等活动的乐趣。然而与伦敦的公园相比，这些设施的使用更大程度地限制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而且也正像那些公园一样，与其说它们强化了城市生活，不如说它们为逃离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场所。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LCC才有机会创造一个规模宏大的、具有十足城市特点的公共娱乐场所。这个机会来自于1951年不列颠艺术节（Festival of Britain）。这是为纪念1851年大型博览会100周年而举办的庞大的全国性展览会；LCC为之作出的贡献是在泰晤士河南岸建造一座音乐厅，也就是皇家节日剧院（Royal Festival Theatre）。<sup>[8]</sup>皇家节日剧院迥异于过去已有的音乐厅，因为其宽阔、开敞的休息厅占据了观众厅四周和下面所有的空间，从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效果，这种效果使人联想到德国的巴洛克教堂。在英国，以往的公共建筑以其公用空间的狭小而著称，所以对于伦敦来讲，出现这样一栋提供了大量公共流动空间的建筑还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这个大型、开敞的休息厅和观众厅本身（每一个座位都设计能获得同样好的音响效果）的空间处理克服了老式的剧场和音乐厅所体现的社会等级观念，即那些能出大价钱买入场券的人总是受到特别照顾。相比之下，皇家节日剧院

被广泛地认作是一个“民主的”空间，在这里所有来访者看起来都是平等的。这栋建筑受到1950年代伦敦音乐厅的常客们如此的青睐，而其空间效果与他们以前在任何其他剧场或音乐厅中所体验的又那么不同，以至于一些人还会记得在音乐会结束后，人们是怎样不愿离开这栋建筑，又是怎样为能有机会与陌生的人群一起徘徊在这个完全现代化的环境里而感到兴奋。

另一项从规模上讲比泰晤士河南岸的新建筑意义更加深远的变化，是伦敦住宅的重建和由鲜明的现代公寓楼房取代大片连排式住宅。大面积住宅群——特别是历史上工人阶层长期集中居住的伦敦东部——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损坏或摧毁。与其按照原有的格局重建这些住宅——当时的观点是整座城市应该尽可能广泛地用4~20层公寓楼房来进行重建——倒不如把战争所带来的破坏看作是为此目的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样，历来非常拥挤的伦敦东部普遍较高的人口密度就会稍稍有所降低，而搬迁户也会因他们新的居住环境的优越和地面上出现的大面积空地而获益。新建的公寓楼并没有按照原有的（但却是大部分已消失了的）街道格局来布置，而是尽可能使住宅内部有充足的采光并且获得日光的直接照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伦敦城尤其那些贫穷的、工人阶层集中的大部分街区都依照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塔楼和塔楼之间宽敞的空地等原则而得以重建。这项恢复重建工程得到政府的资助；那些负责此工程的人则视其为一次以新换旧的机会——旧的是起先在伦敦占统治地位、颇具个人主义特点的住宅形式，而在新的住宅形式中，个人主义已被包融到一个由个体聚集而成的整体之中。人们不仅希望新建的公寓楼能够体现作为集体而不是个体的伦敦城市生活，而且也坚信在拆除和重建过程中产生的宽敞的空地同样会为群体社会生活创造各种条件。

到了1960年代后期，对这些为探求一种伦敦的新形象而进行的住宅开发的批评变得尖锐起来；批评不仅来自公寓楼的工人阶层住户，也来自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人员。公寓楼下产生的空地事实上往往变成了丢弃残废汽车的荒地。接着，伦敦东区的罗南角（Ronan Point）塔楼第18层楼上发生煤气爆炸，因而导致22层的塔楼局部倒塌；这一事件马上为这种城市住宅发展类型的大多数反对势力提供

了一个议论的焦点。结果从这一时刻开始，创造一种以国家提供的住房为媒介、反映城市群体生活的形象的尝试基本上被放弃。1960年代初伦敦的很多区域中建造的公寓塔楼，都在1980-1990年代间被拆毁（常常用爆破的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下制造出壮观的景象），并代之以小型的单体住宅。伦敦传统建筑形式的恢复看起来似乎使伦敦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反群体主义因素变得更加牢固。

用密度更高、群体性更强的居住建筑开发形式来创造高质量的生活的尝试基本上失败了，唯一的例外——而且因为其设计和施工质量远胜过在英国建造的任何其他建筑，所以也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例外——是伦敦城市北端的一个叫做巴比坎 (Barbican)<sup>6]</sup> 的小区开发。巴比坎建造在1924年空袭时被炸毁的仓库和小型作坊的基址上。其规划的主旨是为城市里的中产工人阶层提供高密度住宅，并配备一座中学和一个音乐学校，以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初步建成的巴比坎占地14hm<sup>2</sup>，人口为6500，都安置在2113栋住宅中。其住宅建筑包括3座44层的塔楼（1976年建成时它们是欧洲最高的住宅楼）和环绕中心小湖、内有单层和复

式公寓的一批10层的住宅楼。城市道路围绕在其地段边缘，而车辆入口和停车场都设在住宅楼下。在后期阶段，一座剧场、一个音乐厅和一家电影院也被纳入整个计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比坎计划的庞大规模并非隐而不露：在其中心地带，你可以大致浏览开发区的全景。呈现在眼前的不是由一个个小单元部分聚在一起的集合体，而是一个由数座体量很大的建筑物组成的清楚了、与众不同的建筑群。在这些大体量建筑之间是丰富多彩的庭园，其花木和水池的设计大胆采用了意大利的园林风格。设置在整个设计中心的剧场和学校确保了这



满意的解答；或许是因为对于支配着城市生活的贵族和中产阶级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值得关心的事情。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才能考察最近一段时期出现在伦敦的发展变化。

在为城市发展采取的新的措施中，特别有两项标志了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也就是把伦敦转变为一座公共性质鲜明的城市的开始。这两项措施都是由大伦敦行政委员会 (Greater London Council, 简称GLC) 着手实施的；GLC是从1965年开始接替LCC的伦敦地方管理机构的，这个机构一直到1986年才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取消。这两项措施中相对来说次要一些的，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每天全时向公众开放皇家节日剧院的观众休息厅（过去除了有演出以外，休息厅是谢绝入内的），其结果是这座音乐厅的观众休息厅变成了所有阶层和各式各样的人们广泛使用的社会空间。此举大得人心，而且也表明了人们对舒适的室内公共空间的渴望；这不是一个由在某种商业需求趋使下的购买或消费等活动所支配的空间，而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漫步其中的空间。由GLC采取的第二项措施需要更大的投入，其影响也更加深远；这就是考文特花园



开发区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拥挤的贫民区，而是城市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尽管它在规模和外貌上与伦敦其他部分大相径庭。虽然在建成后15-20年间，巴比坎被认作是过了时的、代表现代主义建筑的老掉牙的产物，可到了1990年代中叶，人们对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整个开发计划所反映出来的胆魄，以及其设计的周密性和高质量，都开始受到人们的赞叹，在这赞叹声中同时也流露出一点对过去某个特定时期的怀念——在那时，任何具有如此规模并且包罗万象的建筑项目都是有可能实施的。

上面刚刚所讲的伦敦建设的简短历史对理解过去20年的变化至关重要。这段历史发展到1980年左右一直还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伦敦人口低密度的状况既没能得到克服也没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表现城市社会生活的称心如意的方法也未能找到。怎样才能将城市社会生活展现在城市居民面前，以致他们不仅可以意识到而且能够理解和欣赏生活在一座大城市中的各种益处？在伦敦，这个问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一直没能得到令人



5 1996年在伦敦被爆破拆除的住宅塔楼 / Residential Tower Block in London, being demolished with explosives, 1996

6 1976年完工的伦敦巴比坎新区 / The Barbican development, City of London, completed 1976

7 巴比坎新区 / The Barbican development, City of London, completed 1976

(Covent Garden) 市场的再开发。考文特花园本来一直是伦敦中部的花卉、蔬菜批发市场：只是到了1973年，这里的市场才关闭，新的市场迁到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地点。考文特花园以伊尼戈·琼斯 (Inigo Jones) <sup>[10]</sup> 于17世纪设计的广场 (piazza) 为核心；花卉、蔬菜市场设置在位于广场中间19世纪建造的四面敞开的市场建筑里，而批发商则占用广场周围和邻近街道上的许多建筑。最开始有些人把市场的迁移看作是考文特花园重新开发成一个商业办公楼聚集之地的有利时机，但GLC决定不去试图最大限度地挖掘这块场地的经济潜力，



而是保留市场和广场周边的建筑并把这些建筑中的空间分给小本零售商用。市场建筑修复之后，在其中形成了一条由屋顶覆盖、包括数家咖啡馆的商业步行街 (shopping mall)，周围街道的商店则由各零售商用。广场本身现在禁止机动车辆穿行，因而也就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GLC的策略在刚开始实施时曾被认为是一种冒险，有可能导致这里变成一块只有空荡荡的、租不出去的商店的无人问津之地，结果此策略获得的成功甚至远远超过了那些最乐观的人们所预料或期待的成效。考文特花园吸引了成群的年轻人和旅游者，来这里的这些人大多没有买任何东西的打算，而只是因为他们在人群中无拘无束地走动，时而进到屋檐之下，时而又在露天当中。考文特花园为伦敦造就了第一个与巴黎的林荫步行街有类似之处的空间，同时也在英国开创了一个先例：伦敦的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城市都曾模仿这一做法，但没有一处像考文特花园这样如此成功。

1980年代在伦敦发生的或许最著名的——但

其意义未必是最重大的——建筑上的争论是围绕着坐落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加建而进行的。起初的投标计划是为美术馆建造一个外加部分，所需的费用将由出租其部分办公空间所得到的资金来负担。这一计划却招致查尔斯王子对中标设计方案的猛烈抨击，整个计划也因此而被放弃，重新制定的设计原则不再考虑商品办公空间，其经济上的可行性则因塞恩斯伯里勋爵 (Lord Sainsbury) 的捐助而得以确定：经过一轮小范围的设计竞赛，一个新的方案被选中。由文丘里 (Venturi) 和斯科特·布朗 (Scott Brown) 设计的获胜方案多方面地显示了对伦敦公共建筑处理方式的变化。选中一个美国职业建筑师的设计，这一结果本身表明了从未有过的将伦敦向国际建筑设计人才开放的意愿。于此之前，在伦敦没有任何一栋重要的公共建筑是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这种只依赖本国建筑师的做法被许多人认为是英国的“缺乏想象力的那种层次上的建筑监护行为” (the unimaginative level of architectural patronage) 的表征。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的设计充分尊重英格兰的建筑传统，尤其是那些画廊的处理基本上源于索恩 (Soane) <sup>[11]</sup> 于1814年为达利奇画廊 (Dulwich Picture Gallery) 所作的杰出设计。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完全没有英格兰特点，即大量空间都用在“毫无用处”的门厅和巨大、雄伟的楼梯上了；除了皇家节日剧院之外，不把一栋公共建筑中很大一块划分给任何一项特定的使用功能，这还是第一次。国家美术馆的塞恩斯伯里侧馆建成于1990年，这个侧馆在英国确立了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建筑观念和做法：即大多数业主曾经会认为是高代价的那种空间上的浪费，相反却是任何一栋被称为“公共建筑”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丘里的塞恩斯伯里侧馆及其陈列着意大利早期绘画的各个精美的展厅，为1990年代一大批新建筑开了一个先例——一栋建筑若要具有“公共”的性质，它就必须把占其容量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专门用作能让到这栋建筑里来的人们自由走动甚至闲逛的空间。

伦敦公共建筑的性质因1993年国家抽彩的实行而发生了完全、彻底的转化。抽彩所得的非常可观的收益全部用于支持那些不属于传统的政府职能范围内的各种事业，而这笔资金的主要部分则花在

艺术和体育领域中重大的发展项目上。伦敦因收到的抽彩资金份额大得不合比例而受到非议，也正因为此，博物馆和剧场方面的新的建筑项目所能得到的资金数量之大是空前的。由抽彩所得收益而资助的新项目包括扩建皇家歌剧院 (Royal Opera House；设计者：狄克逊·琼斯 Dixon Jones，1997~2000建)，将过去的班克赛德发电厂改建为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默龙 Herzog & de Meuron，1996~2000建)，在大英图书馆以前所占的位置上为大英博物馆开辟一个中心庭院 (设计者：福斯特联合事务所 Foster Associates，1997~2000建)，把萨默塞特公馆 (Somerset House) <sup>[12]</sup> 翻新并改建成一个用于画廊和展览的空间 (设计者：英斯基普和詹金斯事务所 Inskip and Jenkins，唐纳德·尹索尔 Donald Insall，狄克逊·琼斯，1998~2000建)，国家画像馆加建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设计者：狄克逊·琼斯，1998~2000建)，以及佩卡姆图书馆 (Peckham Library；设计者：艾尔索普事务所 Alsop Architects，1998~2000)。这一期《世界建筑》已经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这些设计中的几例，不过现在谈一下它们共有的几个特点还是值得的。

颇令某些人惊讶的是，除了最小的，即佩卡姆图书馆以外，这些设计项目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全新的建筑。每一个实例都规模巨大、造价昂贵，但又都是对现存建筑物的改建和增建。即使在皇家剧院这个涉及了大量新的外部修建工作的方案中，其外立面的处理也还是作为伊尼戈·琼斯的考文特花园广场东北角的重新设计、建造的一部分来进行的。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致力于更新旧建筑、而不是创造新建筑的偏爱说成是英国“对文化遗产的崇尚” (heritage culture) <sup>[13]</sup> 和对往昔的过分依恋的表征。但如果19世纪为中产阶级营造的公共建筑已经或多或少使人们对在公共交往中生活不抱什么希望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些1990年代的设计项目看成是对19世纪公共建筑的必不可少的“更正”，只有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工程是把一栋旧的工业建筑改建成一个艺术画廊，而其他项目则都是现存博物馆或剧场的更新和加建，并为之增添一个其过去所缺乏的公共空间。

就拿皇家剧院来说吧，这里的观众厅深受人

们的喜爱,而且其本身也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这家剧院所缺少的却是观众离开观众厅后所需要的空间。在它的旁边有一座19世纪的钢制构件和玻璃材料的建筑,曾用来容纳考文特花园的花卉市场,现在的设计就利用这座业已更新的花厅(Floral Hall)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于是,演出前或幕间休息时,观众可以聚集在这里一同欣赏那灿烂的、由镜面材料勾勒出轮廓的室内景象。其上层的屋顶平台也使观众能到外面去俯瞰考文特花园广场上的人群。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加建设计里看到,这家19世纪的博物馆起初是为少量的、主要来自中产阶层的参观者考虑而建造的,因此其功能不过是容纳展品而已;来参观的人是否想要在这儿逗留,消磨时光和看看其他参观者这样的想法并不包括在博物馆的原始构思当中。而做这些事情的机会恰恰由福斯特设计的有屋顶的内部庭院提供了,而且在规模上,这个庭院已成为整个博物馆中最壮观的一部分。萨默塞特公馆最初建于18世纪后期,因为是政府各部门的办公楼,所以从“公共”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来讲,萨默塞特公馆并不是一栋“公共”建筑,尽管其建造资金来自于公债,但除了在那里工作或去那儿办事的人以外,它不对其他公众开放。新近的更新设计不但把萨默塞特公馆转化成一栋任何人都可随便进出的建筑,而且像大英博物馆内庭的处理一样,还把它变成了供人们在城市中抄近路的一条步行通道。在避开公众视线长达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萨默塞特公馆的内院与河边平台这两处新古典式建筑环境终于为人们提供了远离交通噪音的室外公共休息空间。

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旧电站那高大的、体量与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中殿相当的叶轮机大厅被完全留空,从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体。这是在整栋建筑中的一个内部空间,可是相对于在其北边、与之分离的各展廊来说,它同时又是外部空间,这个大厅实际上是“门厅”,但这门厅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伦敦的其他任何门厅看上去都显得既小气又可怜巴巴。虽然叶轮机大厅也用来展示设置在那里的大型艺术品,其主要功能却好像一个蓄水池:那些早已来到美术馆的人们可以在居高临下、俯瞰大厅的各展厅楼层上看着正在进入大厅的人流。

在每一个由抽彩资金赞助的设计项目中所创造出来的都是一个庞大的、空无所有的空间;就建筑的主要功能而言,这个空间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然而它却使得每位来访的人都处在大庭广众之下。人们不再像彼此相互分离的原子那样,每个人都以一种孤立的方式来使用这里的建筑环境,而是发现他或她自己现在不仅已成为一大群人中的一分子,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观看和审视那一大群人的旁观者。这与大量运载的公共交通中过分拥挤的情形不同,因为在那里每个乘客都设法不去理会其周围的一切,可是在这些新设计的建筑中,享受与陌生人人为伍的快乐已成为一件可能的事情。伦敦的这一变化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到了促使英格兰人走出他们的家门,到公共场合去同陌生人一起享有生活在一座大城市中的体验。□(许亦农译)

#### 注释:

[1] 所谓“连排式住宅”,即并排建造,外观几乎彼此完全相同而由公共墙体相互隔开的一系列2~4层住宅。这些住宅都面向街道,后面为各自的小花园。其首层主要入口都在高出街面约一米左右的台基(terrace)上,从而为地下层房间的采光提供一定条件。每一栋连排式住宅可由多达十几个房间组成,而其平面布局常常很容易使它被分割、改造成几套公寓,后花园也相应地分为几块,以方便每个住户使用。

[2] 这种“酒屋”(pub)的正式英文名称是public house,它是英国最常见的买酒、喝酒的地方,同时也可以在这里买到简易的饭食。一般认为,酒屋与酒吧(bar)不同,后者多有现场演唱等服务。

[3] 奥斯曼的全名是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1809~1891,1848年法国大革命后,他支持路易·拿破仑的事业,并于1854年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塞纳河省总督。1854~1870年期间他主持了巴黎城市的改建规划。

[4] 法国诗人,全名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以其作品中的阴惨意象而著名,主要作品包括1857年出版的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5] 劳埃德协会成立于17世纪后期,是伦敦保险商的一个组织。开始时只经营海上保险和提供航运信

息。现在它从事各行业的保险业务并且发表每日的劳埃德协会海报(Lloyd's List)。协会的名字来源于早期咖啡屋的主人,埃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大约死于1726年)。

[6] 威斯敏斯特(现在也有译为“西敏寺”)亦称为威斯敏斯特市(City of Westminster),是大伦敦(Greater London)的一个行政区。它包括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和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由于威斯敏斯特行政区是英国议会的所在地,所以这个名称也代表英国议会。白厅大街由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延伸到议会大厦,是英国政府各部门集中的地方。因此,白厅也成了英国政府和其中央行政机构的代名词。

[7] 丽都一词来自意大利威尼斯附近一个小岛的名称。这个小岛因其海滨浴场而著名。

[8] 音乐厅由莱斯莉·马丁(Leslie Martin)、罗伯特·马修(Robert Matthew)等设计。

[9] 这是一个著名的建筑群体工程,包括住宅开发和含有音乐厅、展览厅、剧场、电影院等设施的巴比肯艺术中心(建成于1982年)。

[10] 伊尼戈·琼斯(1573~1652),英格兰建筑师和戏剧艺术设计师。他把帕拉第奥的建筑形式引进英国。琼斯大约是在1630年左右设计的考文特花园广场。

[11] 约翰·索恩(Sir John Soane,1753~1837)是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之一,其作品以浪漫地融合古典建筑与哥特建筑风格为特点。

[12] 萨默塞特公馆是由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1723~1796)设计,建于1776~1779或1801年的一座政府办公楼。

[13] 在这里,“heritage”一词的意思是“the evidence of the past, such as historical sites, buildings, and the unspoiled natural environment, considered collectively as the inheritance of present-day society”,而“culture”一词指的是“the artistic and social pursuits, expression, and tastes valued by a society or class, or the enlightenment or refinement resulting from these pursuits”,定义录自The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1986年第2版。